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亲历毛泽东“文集内片”的摄制	叶永烈
【千秋功罪】	姚文元为什么没有写回忆录	萧功秦
【亡灵祭坛】	大饥荒时代的英勇记录——记《星火》反革命集团案	裴毅然
【往事非烟】	咸宁干校三记	王世襄
【动乱年代】	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下）	杜钧福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亲历毛泽东“文集内片”的摄制

• 叶永烈 •

◇ “臭老九”突然成为“通天片”导演

对我来说，在1976年奉命为重病在身的毛泽东主席拍摄“内片”，完全出乎意料。

当时，我正处于“赋闲”状态。1976年5月初，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内片”摄制组。已经复职的上海科教电影厂厂长洪林以及派驻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找我谈话，突然宣布我被任命为上海“内片”摄制组组长兼导演。

这一任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且使我的同事们都惊讶万分。因为我在“文革”中被打成“文艺黑线干将”“大毒草作者”，遭到抄家，在“五七干校”度过三年，然后去“深挖洞”——挖防空洞及做煤渣砖。这样的“臭老九”，怎么可能去拍摄“内片”呢？

在当时，所谓“内片”，也就是保密性极高的影片。进入“内片”摄制组的每个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接受任命之际，我理所当然提出自己的疑问。经过解释才明白，这一“内片”是“中央直接交办”的，必须限时限刻完成。这些“内片”，并不是关于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之类的保密片，而是专为“中央首长”拍摄的娱乐性影片——代号为“文集内片”。

当时对“内片”的要求是质量高、速度快、限时限刻完成。在任务下达后，必须在半个月以至一星期内完成影片——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速度。

后来才知道，这些“内片”专供病重的毛泽东观看，在北京与上海两地各成立“文集内片”组。由于是专供毛泽东观看的“通天片”，所以提供的拍摄条件是很好的。

上海的“文集内片”组，一共成立三个摄制组，呈“三足鼎立”之势。我所负责的上海科教电影厂的摄制组有50多位工作人员，赶拍《驯兽》以及《京剧唱腔音乐》。另外两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则拍摄京剧“旧戏”——才子佳人戏。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

拍摄京剧“旧戏”的两个摄制组，由张天赐、岑范两位老导演负责。跟这样的老导演“三足鼎立”，而且又是“中央交办”的摄制任务，我不能不加倍努力。那些日子，我没日没夜、全身心投入地工作。

后来才知道，我作为“臭老九”，突然被起用，是厂长洪林提名。派驻的工宣队并不了解我，而是洪林对我十分看重。

洪林，清瘦的小个子，文质彬彬，讲话总是慢慢的。即便是在三伏天，他仍穿长袖白衬衫，领口、袖口的纽扣扣得紧紧的，整整齐齐，却并不出汗。他原名绳曾，安徽泾县人，生于1917年，是来自延安的老干部。

在“文革”前，洪林已经调往上海电影局任副局长，“文革”开始后，造反派把他“揪”回厂批斗。他是建厂元老，所以作为“祖师爷”遭到恶斗毒打，以致一度服安眠药自杀，幸亏夫人及早发现，送医院抢救。洪林虽被关押在“牛棚”多年，但他在那里静静地观察着厂里的各色人等。

洪林由于没有历史问题，在“文革”末期终于被“结合”到领导班子之中，人们笑称“红厂长”（洪厂长）官复原职了——因为在“文革”中拍摄的电影里，总是把“走资派”厂长取名为“白厂长”。

我跟洪林只有工作上的交往而已。据说，他曾仔细看过我的作品，所以对我的创作能力相当了解。在1976年，尽管厂里资历比我深、经验比我丰富的老导演多的是，洪林却决定起用我这个36岁的青年导演。

洪林以为，为了确保如期完成“中央直接交办”的“文集内片”，必须挑选“手脚快”、年富力强的导演。我在同行中向来有着“快手”之誉，不仅剧本写得快，拍摄影片也快。

我明白，在厂里，能够被任命为“内片”导演，表明在厂领导眼中，我已经是“强盗”了，即“强导”的谐音。在电影厂，习惯于把最拔尖的导演称为“强盗”——“强有力的导演”。

于是，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日子里，我变成了“忙人”，兼编导于一身——自己写剧本，自己导演。我又兼任组长，负责摄制组50多人的日常工作。

从1976年5月接受任务，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短短4个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

◇ “文集内片”参与者的回忆

自从担任“文集内片”导演之后，我的“顶头上司”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他的名字取自“孔子在齐闻韶”的典故。他是老一辈电影人，编导出身。当时，我喊他“老齐”。齐闻韶是一个和善的老头儿，常常一声不响来到拍摄现场。他有很丰富的现场工作经验，会给我很多宝贵的指点。

我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他会及时向上一级领导——另一个老齐报告，即齐英才。齐英才 是上海京剧院副院长，著名京剧演员。他的夫人是有着“中国京剧第一女武旦”之誉的张美娟，而他的妹妹则是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小常宝”的齐淑芳。

由于“文集内片”的拍摄处于极端秘密之中，关于其中内幕，我只在1992年第2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见到齐英才的一篇回忆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齐英才回忆道：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地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

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瞎，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这脑袋轰的一下就像炸开了。

这八九年来，为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戏，我吃的苦头还少吗？现在是什么时候，八个样板戏唯恐大树特树还不够，搞传统戏，岂不是黑线回潮，复辟倒退吗？这可是拿政治生命开玩笑呀！我急忙摇头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

孟波见我如此顶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

登上飞机，孟波和我相邻，待飞机升空，他瞧瞧前后左右，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是毛主席要看，因为你熟悉京剧，所以非你莫属。”我这才恍然大悟。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主席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像、拍电影。这个决定使江青等感到为难，顶着不办，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办，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这十几年来所作所为。所以江青几次找于会泳等商量对策，结果是打出“给中央负责同志作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空虚，并且尽可能缩小范围、对象，严加保密。

在我拍摄“唱腔音乐”影片时，上级指定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连波先生为影片的音乐顾问。连波总是笑脸迎人，很客气。他很细心、很耐心向我讲解“唱腔音乐”的特性以及种种京剧唱腔知识。

后来，刘惠恕在《〈毛泽东晚年存藏词曲〉析疑及抢救这一历史文献的学术意义》一文（载《炎黄子孙》2004年第2期及《上海戏剧》2004年7月号）中，写及连波先生对“文集内片”内情的一些回忆：

这批剧目弥足珍贵，拍摄的目的，是供毛泽东欣赏的。这一工作参与人数甚多，不会少于百人。而在北京为古诗词谱曲及演唱工作则始终是处于高度的保密之中，前后参与人数不会多于30余人，参与者各司其职，工作（作品陆续拍摄）完成后，交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

审定，然后再交江青复审，最后呈送毛泽东主席欣赏。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去世后终止。

◇ 跟不听话的“演员”打交道

在“文集内片”组，我导演了多部《驯兽》影片。《驯兽》是有趣的影片，它的主角是猴子、狗熊、熊猫、狗。给这些不听话的“演员”拍电影，曾发生许多有趣的故事。

在影片《驯兽》中，猴子穿着鲜艳的背心和三角裤，狗熊穿着漂亮的背带尼龙纱裙。动物们穿上这些别致的衣裳后，显得好看多了。特别是狗熊，本来浑身黑不溜秋的，很难看，穿上艳丽的衣服，色彩就丰富多了。可是，要给猴子、狗熊做衣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有给动物做服装的裁缝师傅呀？

我们跑了好几家服装店，都找不到这样的裁缝。后来，我们想起来了：在美术片中，那些小猫、小狗木偶，不也穿各种服装的吗？于是，就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求援，他们热情地答应了。

不过，木偶是死的，可以用尺子精确地量好大小，可是狗熊一看见生人走过来量它的腰身，立即呜呜大叫，张牙舞爪扑过来，把裁缝同志吓了一跳。好在做衣服的是老裁缝，富有经验，用眼睛一看，就大致估出了狗熊的腰身，做出了合身的衣裳。

平时，我们都是给人拍电影。拍摄前，请演员一遍又一遍地做着重复的动作，进行排练，一直到合乎要求，才开始拍摄。给动物拍电影，起初拿拍人的一套办法拍，反反复复地排练。可是，动物是不听话的“演员”，排了两遍就开始不耐烦了，再排下去就发脾气了。

再说，动物平时一直在舞台演出，习惯于演完一个节目就演另一个节目，形成条件反射了，而拍电影却反反复复拍其中一个节目，它们给弄糊涂了，越来越不高兴。

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一只名叫“力力”的猴子拍摄“绕红灯”的节目。平时，在舞台演出时，力力总是十分轻松地骑着自行车绕过一只只红灯。可是，在拍摄的时候，由于反复排练，力力每次从红灯绕过时，总是把红灯碰倒了，拍了好多次，没拍成功，弄得力力越来越紧张，而越紧张便越是碰倒红灯。这时，驯兽演员给力力按脉搏，发现它每分钟心跳达180下，不能再拍下去了。

吃一堑长一智，第二天晚上，我们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一次也不排练，就让力力骑三轮车绕红灯，结果力力表演得非常好，一个红灯也没碰倒，我们一次就拍成功了。

还有一次，拍摄一只名叫“扎利”的黑熊表演“蹬火把”的节目。为了使火把能拍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特地在火把上加了许多汽油。在拍摄时，扎利看见那么大的火，吓得逃掉了。拍了好几次都没成功。

后来，在驯兽演员的帮助下，想出了巧妙的办法来对付这个不听话的“演员”：在火把上浇足汽油后，先不点火，给扎利蹬。扎利十分轻松地蹬着。这时，我们突然用点火棒点着了正在旋转的火把。扎利虽然吃了一惊，但不敢甩掉正燃烧的火把，怕弄得不好烧着自己身上的毛，于是竭力用四只脚迅速地转动火把，想把它转灭，火把却越转越旺。我们开动摄影机，拍下了这个精彩的镜头。

◇ 拍摄《京剧唱腔音乐》的青年才俊

在“文集内片”组，我还导演了多部《京剧唱腔音乐》影片。所谓“京剧唱腔音乐”，是用乐器模仿京剧唱腔，使乐器演奏人声化。这是很细心的创作，要学得像，要有韵味，要体现出京剧唱腔中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

拍摄《京剧唱腔音乐》，跟拍摄《驯兽》全然不同。《驯兽》是充满动感的影片，而《京剧唱腔音乐》是动作幅度很小的影片。动有动的难拍之处，静又有静的难拍之处。

最为难忘的是为后来被誉为“二胡皇后”的闵惠芬拍摄舞台纪录片。在“中央交办”的一系列拍摄任务之中，有两集闵惠芬的节目，即用二胡演奏唱腔音乐《柴桑口》和《文昭关》。闵惠芬接到通知，拿着二胡来到上海泰兴路的政协小礼堂来找我。当时，为了“保密”，电影不在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拍摄，而把空置的上海政协小礼堂作为临时摄影棚。我带领50多人在那里日夜兼程拍摄。我跟闵惠芬就在那里第一次相见。

在我的印象中，二胡仿佛是男人的“专利”。我所熟知的二胡演奏家刘天华、瞎子阿炳，都是男性。当31岁的闵惠芬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惊讶，哦，女性也能成为二胡演奏家。

我请她奏一曲《二泉映月》，立即被她指间泻出的琴声所征服。我们聊起了二胡，非常投机。我年轻时喜欢用二胡演奏《病中吟》《良宵》《光明行》《二泉映月》《空山鸟语》，所以跟闵惠芬有着共同语言，一见如故。她在奏毕《二泉映月》之后，又应我之求拉了一曲《病中吟》，琴声如泣如诉，深深感动了我。

接着，我们的谈话进入正题。当时我还接受了另外3部京剧唱腔音乐影片的拍摄任务，即汤良兴用琵琶模拟余叔岩、谭富英演唱的《空城计》，项斯华用古筝模拟程砚秋演唱的《文姬归汉》，还有韩凤田用擂胡模拟新艳秋、言菊朋演唱的《游龙戏凤》。当时我并不知道，由于毛泽东喜欢这些京剧唱腔曲目，中央有关部门指令民乐演奏家们排演京剧唱腔音乐。

听了闵惠芬演奏的《柴桑口》和《文昭关》，我的直感是闵惠芬用二胡模拟京剧唱腔是最成功的。闵惠芬说，这是因为二胡比琵琶、古筝、擂胡更加接近于人声的缘故。琵琶、古筝是弹拨乐器，声音不连续。擂胡虽然是二胡的变异，但是音调过于高亢。

闵惠芬告诉我，京剧名家杨宝森的唱腔雄厚，她用二胡粗犷的音调来表现。闵惠芬又讲述京剧名家言菊朋的演唱特点。她讲一句，就用二胡拉一句。她给我提供了《柴桑口》《文昭关》乐谱。闵惠芬向我讲解演奏的内容时，还把唱词写在我的导演笔记本上。

7月正是上海的大热天，那时候上海政协礼堂没有中央空调，闵惠芬常常汗流浹背，她仍不厌其烦地配合我们反复演奏。直到正式拍摄，她换上演出服——浅蓝色的连衫裙，补好妆，摆好姿势演奏。

在完成影片之后，闵惠芬很高兴地说：“导演懂二胡，所以影片能够很好展现二胡的演奏特色，我很满意。”我没有想到，小时候对二胡的爱好，竟然在电影导演工作中派上了用场。

当时选用演奏京剧唱腔的演奏家，颇有眼光，在年轻演员中选择了最优秀的才俊。闵惠芬后来成为中国的“二胡皇后”，而项斯华后来则成为“中国古筝第一人”“筝乐大师”。当时36岁的项斯华用古筝模拟程砚秋演唱的《文姬归汉》，深沉而悲凉，曲终意未尽，余音绕梁。

2007年，我应邀到澳大利亚讲学。在悉尼，我拜访了音乐家杨明先生。他知道我认识项斯华，便从书房里取出项斯华所著的古筝琴谱。在古筝琴谱中，最后一曲，便是《文姬归汉》。杨明先生告诉我，他非常崇敬项斯华。他就是以项斯华所著的古筝琴谱作为教材，教授学生学习古筝。从杨明先生的谈话，也可以一窥项斯华在古筝演奏中的大师地位。

◇ “文集内片”停止摄制

1976年9月9日，我正在拍摄现场，突然接到通知，收听重要广播，中止拍摄。广播里传出哀乐，毛泽东主席病逝！

“文集内片”的摄制，随之戛然停止。

在毛泽东去世后，我除了把已经拍摄的内片完成收尾工作，又奉命写摄制小结。在我写完摄制小结，过完国庆节休假后，便从北京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粉碎“四人帮”！

□ 原载《同舟共进》2016年6期

~~~~~

【千秋功罪】

姚文元为什么没有写回忆录

• 萧功秦 •

有人把《姚文元回忆录获准出版》一文发到微信上来了，此文点击量达144万，可见影响之大。该文说曾有人愿意出五百万买断姚文元回忆录的版权，该文还自称在此文中透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于是吸引了众多读者。

然而读下来就知道是假的。此文的内容，大部分都是编造的。我把这一事告诉群里各友，许多人都很惊讶。说实在话，对大多数非历史专业的普通读者来说，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在貌似有点历史知识的造谣者面前，其实都是弱势群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看来有必要出来打假。

该文中最荒唐的谣言，是所谓“姚文元回忆录”中记述，毛泽东临终前把江青定为党主席，让毛远新任人大委员长，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因为毛从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与1976年早春的四五运动中，就知道“四人帮”根本成不了气候，无法掌控局势，更何况毛也深知江青为人太刻薄而且心理不正常，根本不能服众。

毛远新也不可能成为毛的接班人，除了毛远新太年轻，没有经验外，更重要的是，毛毕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家天下”还是忌讳的。那一代经历过反封建运动的共产党人，都有他们的理念、底线和基本原则。这是中共党人与朝鲜劳动党人不同的地方。

有人说，毛不是说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吗？无法无天，不等于什么都可以去做。有原则与底线其实并不难理解，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充满了人情与正当性的矛盾。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

文中又提到“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之后，有40个将军联名建议不要判处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军委办事处四将死刑，这也都是谣言。文革体制下根本没有这种让将军们自由讨论中央要犯的处置意见的做法。服从并执行命令就是军人的天职，再说当时的中央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四将处死。其实，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审查者也明知他们与林彪出逃事件并没有关联，（后来纪登奎在文革结束后还作为中央调查组负责人正式向四人宣布过这一点。）当然，为了当时文革的反林彪集团的政治需要，他们必须被关起来，如此而已。何来四十人要求不判死刑？读了四将各人写的回忆录，就足以了解这一内情。

文章中称姚文元被捕以前，到张春桥家商量去不去开会的事，这也是假的。姚被捕以前处于被严密监控状态。张春桥也更不会笑着建议他去参加会议，并称这是他“当政治局常委的机会”。张春桥女儿回忆中早就提到过，张本人对自己被捕就早有预感，他甚至预言自己将来是在某次不得不参加的会议过程中被捕的。其实姚文元当时根本就没有找张去商量，他就直接去开会了，在他看来，去开这个会是很自然的事。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快就会走到政治人生的终点。

关于姚文元写回忆录的事，实际上是纯属子虚乌有，事实上，据我直接了解，姚文元家人从来没有见过姚文元出狱后写过回忆录。姚家人回忆，姚文元出狱后，曾在日历本上零零散散写一些并不系统的、估计史实价值也并不高的日记，出了一本天文历法方面的通俗读物，也没有多大价值，如此而已。

当然，遗憾也在这里，中国当代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余生之年，不为后人留下一点自己的人生心得，不披露一点政治隐秘，确实也太不够意思了。

相比之下，林彪手下的军委办事处四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在21世纪前十年里。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或留下家人的回忆记述，其中邱会作回忆录的史学价值尤其被历史学界公认。让我们与百年后的国人对共和国的历史，对林彪事件与整个文革史，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这些书的问世，让2009年以前匆忙写文革史的人的作品变得相形见绌，有的书甚至变得不值一读。当然，这些回忆录也有其缺陷与片面性。其实这也没有关系。

蒯大富、聂元梓都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陈伯达也留下了口述文字，连文革五大领袖之一的王大宾也有回忆录出版，蒯大富在回忆中披露，1967年年底，由清华红卫兵出面，在社会上点名打倒刘少奇，是张春桥事先特地把他找过去，在中南海的门房间里，与他进行私密谈话时指示他的。由此可以看出，北京红卫兵的重大活动并非自发，而是有当道者严密控制与策划的结果。

聂元梓2005年回忆录中披露她参与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的全过程。让我们知道，那张著名大字报，是由他们七人出于对校党委的不平之气，自发写成后，再请生康生老婆，问能否贴出去，并非外间广泛流传的由康生策划的。

王力的回忆录过于妙笔生花，夹带了许多水份，这一点被戚本禹指出过，但也毕竟披露了重要史实。徐景贤的回忆录对于了解“上海帮”极有价值，是任何研究文革史人的重要参考书。即使百年以后。

戚本禹死后才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当然问题多多，戚氏如活化石般的思想僵硬，也可堪称一绝。但却仍然留下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史料。

例如毛泽东在1966年5月在杭州把陈伯达、杨成武与戚本禹召来，习惯于白天睡觉的毛泽东，通知警卫员等人到了后就立刻叫醒他，当天清晨，刚睡下不久的毛泽东，一听到三人到了，就立刻兴奋地起床，喝着马奶，向他们大谈五七指示，可见毛对自己新想法的重视，毛认为，“在东汉农民领袖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也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张鲁就有共产主义想法。”毛说，“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毛认为“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

毛还说，看来，人类的文明是可以设计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文明，所以可以设想与设计。

这种建构理性主义思维，正是毛泽东的乌托邦的思想根源。戚本禹也看出毛泽东讲五七指示，实际上展示了文革后社会的理想前景。这些史料价值很高。它充分说明文革发动者并不是单纯的权力之争，它有极为深厚的复杂思想根源。

回忆录当然不一定都说得对，许多回忆录合在一起读，就会产生史学上奇妙的“无影灯效应”，如同手术室中的无影灯下不再有阴影一样，众多回忆录的迭加，让历史中被屏蔽的真实部分得以显露出来。

事实上，依我看，以姚文元的性格，他很可能属于那种出狱后什么回忆都不写的人。姚这个人思想一直很左，是那个时代的真左，又很能写，也很勤奋，由于历史的机缘而被上面看中，从此飞黄腾达，自己也得意忘形，姚文元不修边幅，喜欢用袖子擦嘴上的油迹，为人属于那种简朴又比较无趣的类型，性格上比较老实，甚至看上去还有些愚钝，胆子也不大，并没有太大的权力欲，更多的是文人想出名的那种欲望很强。这也是他人生的动力。这一点，徐景贤在其回忆录里点得很准。在我看来，也许正因为有如此的性格，反而能与雄心勃勃，城府很深的张春桥配合得很默契。

姚文元也不是那种才气纵横的人，根据这种胆小怕生事的性格，又遇到罪有应得的牢狱大灾，他可能一辈子不会写回忆录。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可能没有写回忆录的强大动力，他缺乏足够的自我反思能力，意识形态文章写惯了，写起来放不开手脚，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新也不是，旧也不是，说起来吞吞吐吐，不能一吐为快，总是担心政治不正确，连真心话也讲不清楚，估计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干脆一烧了之。当然这是我根据我对他的性格而作出的大体判断。斯人已去，已经永远无法知道了。

历史人物为什么都喜欢写回忆录？这可以从心理学来解释，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说的就是人都有一种被他人认同的愿望，他希望通过自己对人生道路的解释，让别人理解自己是同类而不是异类。当然，如果在辩解自己的同时，又能反思自己错误与人性缺陷，那就有了真正历史的价值，因为他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提供了反面的经验与教训。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就是《徐景贤最后回忆》这本书了。姚文元终生没有写出自己的回忆录，他失去了向世人表白自己的机会，也让世人少了一份极左思想史的珍贵资料，对于他本人与社会，其实都是遗憾。



戚本禹和姚文元相比，正好相反，他才华横溢，咄咄逼人，自以为是。用回忆录来发泄自己的失落的情怀，就成为他的写作动机。他坚持自己的极左理念，对文革受害者没有内疚与歉意，连因为他的挑动而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共和国部长张霖之，也只是轻描淡写，为自己开脱。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避免把自己看作是人生的彻底失败者。他缺乏承认改革开放大趋势的正当性的勇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表面上强者，其实是真正的弱者。

几年前蒯大富到上海，我请他介绍我结识住在浦东的戚本禹，第二天蒯大富给我打电话，说已经与戚本禹讲好了。我满怀希望地打电话给戚本禹，希望见上一面，特别想听听他的一些人生感悟与心得，遗憾的是，他在电话里并没有当场同意，我也在事后没有坚持再打电话约他见面。也许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太不喜欢他的思想僵化了，但现在看来，有这么好的机会却不能争取去倾听。也是一种遗憾。一个好的历史学者，应该是习惯于在倾听中捕捉历史的真实信息的人，而不应该像我这样。

这里再顺便提一下毛远新，毛泽东是很信任他的，毛把他塑造成一个斯巴达战士，处处严格要求他，相信也在一定程度上很欣赏他。但毛并没有想到要有意培养他接班。我想，毛远新年纪太轻，没有经验，资历不够，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是最为看重后人的历史评价的，他不愿意让后世留下“家天下”的印象，正因为毛从来没有想培养毛远新继位，所以在毛逝世后，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在北京就没有事可做了，华国锋的中央决定让毛远新回东北。为这事华国锋还与江青还斗了起来。

毛远新被判了十七年徒刑，他的独生女儿因他而终身残疾，毛远新出狱后为人低调，工作勤奋努力，不少人都为毛远新的命运感到可惜。

然而，根据多种当事人回忆录记述，毛远新人生最大的、甚至几乎逆转中国命运的重大错误，是在1975年9月向毛主席汇报时，称“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反映了邓小平的一些言论。毛泽东指示毛远新与邓小平再次谈话。邓小平坚决不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不为所动。从此，邓小平被作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再次被打倒。事后，毛远新还颇为得意地向徐景贤介绍自己如何打倒邓小平的。

众所周知，在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问题以前，邓小平已经是大权在握，众望所归，权力地位党内无人可以撼动，林彪已死，周恩来病重，且已经在1973年底就被边缘化，而四人帮也已经无力应付邓小平这个强大的政敌，毛也准备在生后把大权交给邓小平，且1975年秋，毛已经有他本人并不知道的不治之症在身。中国的命运向好的方向发生重大的转折，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邓小平却因为毛远新的小报告，而在阴沟里翻了船，如果不是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后来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国的命运之船方向，将就由毛远新的大错而铸定了。

不知道毛远新本人面对四十年来中国的伟大历史进步，对自己的过去，是不是有所反省。人类的历史有时真的很奇怪，一个看上去不大不小的历史人物，一个本质上并不坏的人，由于错误观念的迷失与执着，从而由此而引发蝴蝶效应，差一点改变一个十多亿人的民族的命运走向。

□ 来源：《萧功秦论评》微信号

~~~~~

【亡灵祭坛】

大饥荒时代的英勇记录——记《星火》反革命集团案

• 裴毅然 •

〔编者按：六十年前，一九六〇年的大饥荒年代，兰州一批勇敢的大学生联合苏州的林昭，决定出版地下刊物《星火》，试图唤醒党内外起来推翻当时的政权。事败后四十余人被捕，其中林昭、张春元和杜映华三人在文革期间被处决，案情由幸存的女犯谭蝉雪著书披露。〕

北大烈女林昭之所以被捕并判刑二十年，研究林案的人都知道，案底并不在右派身分，而在于一份秘密刊物《星火》。

一九六〇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在甘肃武山油印三十余份，第二期已组稿，但未及印出。六〇年九月，该案因两名告密者发于天水，列为全国“第四大案”，定性“反革命集团案”，四十三人被捕，其中大学教师一人、研究生一人、大学生十二人（其中兰大八名）、干部三人、农民二十五人；判刑二十五人。六八年林昭遇害；七〇年兰大学生右派张春元、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同时殉难。

八〇、八一年，《星火》全案获得艰难平反，但不可查阅档案，“案犯”无法获悉判决的依据。今年（二〇一〇年）二月，《星火》惟一女犯谭蝉雪（1934—）在香港出版《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天马出版有限公司），五十年前的“第四大案”终呈于世。前北大教授钱理群序言：“这本拿在手里都会颤抖的好沉重的书，我们将如何面对呢？”

谭蝉雪，广东开平人，职员出身，五〇年入广西革大、后留校，再入越南留学生中文专修学校、桂林文化馆，五六年以调干生入兰州大学中文系，五七年划右，被称“兰大林希翎”，是《星火》组织重要成员，六〇年六月因偷渡香港未遂被捕，旋因《星火》案判刑十四年；七三年底出狱，进酒泉“二劳改”安置性小厂；八〇年平反，任教酒泉师校；八二年调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九八年退休，定居上海。

◇ 星火案主要“案犯”（除林昭外）

张春元（1932—1970，《星火》核心），河南上蔡人，四八年底参军，志愿军坦克兵，王首道小车司机，五六年兰大历史系调干生，右派；五九年六月号《电影文学》发表张匿名作品文学剧本《中朝儿女》，应邀出席长影新片摄制计划会，天水马跑泉公社党委闻讯致函长影，揭露张右派身分，拍戏作罢。六〇年七月被捕，八月十日越狱，六一年九月六日再捕归案，押于天水三监，上手铐脚镣；原判无期，七〇年三月处决于兰州。

杜映华（1927—1970），甘肃陇西土店子村人，陇西师范学生地下党，历任中共漳县副书记，武山县委副书记、城关公社第一书记，五九年划右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六〇年二月被捕，七〇年与张春元同在兰州被处决。

胡晓愚，九江人，北大化学系研究生，留校助教，五五年调兰大，化学系讲师，右派，判刑十五年；平反后为兰大教授。

顾雁，上海人，北大物理系毕业、兰大物理系研究生，右派，判刑十七年，服刑青海，平反后任教兰大，八五年教授，后调科大物理系。

苗庆久，北京人，出身地主，公安司令部边防保卫局中尉，五五年考入兰大物理系（调干生），右派，判刑二十年；平反后分配兰州连城铝厂中学，高级教师、校长、厂教办主任。

向承鉴（1938—），江西武宁人，五六年考入兰大化学系，右派，判刑十八年；平反后分配兰州连城铝厂中学，教导主任、校长。

何之明，长沙人，五六年考入兰大物理系，右派，判刑十五年；平反后分配兰州连城铝厂中学任教，八二年定居美国。

杨贤勇，四川人，五五年兰大中文系调干生，右派，判刑十年；平反后分配兰州三十四中，高级教师，二〇〇五年病歿兰州。

被判刑十年以下者：孙和，上海人，陈德根，四川达县人，贾启贤，农民基层干部。梁炎武，北大助教。罗守志，甘肃人，武山县委农工部长。胡学忠，武汉人。田昌文，武汉人。谢成，陇西人。

几位受牵连者如下：兰大化学系学生右派冯涉筠关押近一年，无罪释放后兰大拒绝接受，四处流浪，文革中被遣煤矿，死于矿难。兰大化学系学生右派邓得银，六一年毕业分配通渭中学任教，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兰大化学系学生右派吕绥生，六一年毕业分配兰州西固六中劳役打杂，文革遭毒打，妻小赶入农村，备受歧视近二十年，后为教授。

◇ 悲惨大饥荒带来反抗勇气

反右运动，五年制全国重点理科的兰州大学，划右195名，占全校人数百分之十四，其中学生143名。谭蝉雪的右派言论乃引用民谚“国民党贪污，共产党贪功”及日记中的“爱情自私论”。这些马列青年划右后，满脑子问号，无法接受爱党之心竟结反党之果。

思想资源上，这批兰大右派学生除了马列主义，并无其他影响，甚至未接触欧洲人文名著，他们对“当代统治者”的批判与仇恨，完全源自“事实唤醒”，从大饥饿的悲惨现实中意识到反右、三面红旗的荒谬，看清公社化运动对农村生产力的大破坏，从而产生反抗动力。

“伟大的混帐”与“血淋淋的荒唐”，“事实的结论是：共产党叫人民受饥饿！共产党害死人！”林昭说：“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向承鉴：“自从知道庐山会议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我已心灰意冷，对毛为首的党不再抱幻想，将我《给党中央的上书》愤怒地撕成粉末。”

良知使他们铁肩担义。五九年十月，饥情已蔓延普遍，饥民遍地乞讨。向承鉴的哥哥（山西化工设计院工程师）劝弟弟不要去管农村饥情。向承鉴答曰：“不是管得了管不了的问题，是应该管不应该管的问题，是该不该想的问题。如果人人都采取回避态度，‘匹夫有责’就成空话，这正是当前局面得以发生的原因。”当向承鉴赴京看到十大建筑：“这些建筑的豪华气派与农民啼饥号寒的景象该有多大的反差啊！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这些建筑是供人观瞻、供人享用的。为何不先解决人的温饱生存而后再盖它们呢？难道脸面比起农民的死活更重要吗？我疑惑惶恐。即使北京，在刻意镂雕的繁荣背后，还是能发现饥寒交迫的身影。”大学生们备受良知的拷问！

◇ 《星火》的诞生

五九年五月，兰大学生右派张春元、顾雁、胡晓愚、孙和聚会天水马跑泉公社拖拉机站，分析形势后，张春元提出“巩固地位、扩大组织、联系同志”的活动方针，形成意向：通过串连成立组织；对社会变革作出两种估计：一、自下而上的农民暴动；二、自上而下的宫廷政变。顾雁提出内部必须有经常性刊物，定名为《星火》，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昭与《星火》有联系源于北大女生右派孙复（下放青海民族学院），其兄孙和为兰大学生右派。孙和一开始冒用其妹名义与林昭通信，后直接联系，林昭寄去诗歌《海鸥》，张春元意识到林昭能量，很快联系林昭，数次上苏州面谈。林昭最初并不同意冒险刻印小册子，但最后还是同意，她将《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发表于《星火》首期。

六〇年四月，顾雁、张春元、苗庆久在上海南汇瓦硝公社黑桥顾家聚会，议定《星火》散发至最高领导层，计划八月份在五大城市（京沪汉穗西安）邮出；意在使中共高干相互猜疑，受刺激而觉醒。同时议定：《论人民公社》写成后，印发全国公社书记以上干部。

顾雁撰写《星火》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是清醒的时候了！……几年来倒行逆施的结果，目前的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一步步踏着秦始皇的覆辙。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做私有财产，事无巨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正是这一次比一次彻底的反右运动，正是这一天等于廿年的跃进，加速了目前统治集团的死亡。……为彻底摧毁目前的强权统治而奋斗！

◇ 矢志摧毁共产党独裁政权

▲ 向承鉴的《自白》《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我们反对的是已腐朽透顶而自己标榜为英明伟大的所谓共产党的现政权，并且矢志不移地为彻底地摧毁它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它们假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对国内人民实行反科学反人性的法西斯官僚独裁统治……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质变的起点，从此它就失却了改好的可能性，开始公开走上与人民为敌，与道义、人性为敌的道路，步入反动的深渊。

人民公社的最反动性在于它拆散家庭，使父母妻儿东西南北，这是对人性最基本特征的否定。……反右倾运动证明：在统治集团内部已有很大一部分不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反动的政策，它的实质和表现是：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空前大分裂。……当代统治者已经彻底背叛了工农群众利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自己失去了群众基础，得下了不能诊治的极症。……小规模农民暴动已满地星火了。……当代统治者的死期也愈加逼近了。

▲ 张春元的《粮食问题》《论人民公社》：

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手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一只手却狠狠地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在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用自己编造的账单，来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欺骗、撒谎、吹牛、夸张，没有一句真话，从上到下，大家都

尽力打肿脸充胖子，把臃肿说成是“发福”……当今统治者用庸俗的暴发户的资产阶级的虚荣心理（呸！还有脸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呢！）不惜让国内人民牺牲一个人的起码物质需要，放弃人的生活权利——吃饭！……“为人民服务”这个招牌是多么的虚伪和无耻。

在高压的气氛里，同志们都不得不附和与服从。这种虚假的统一使领导人日益狂妄和骄傲，不顾一切地推行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把先烈们以鲜血换来的政权当作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终于走上专横独裁的道路。

▲ 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杜映华的认识：

推翻蒋家王朝主要是农民的力量，多少农民家庭送子送夫为革命捐躯。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反抗它的人都施以无情的镇压，蒋介石不知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多么奇特古怪的现象呵！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

▲ 何之明的《论“政治挂帅”》：

剥去画皮，原形毕露，原来所谓“党的绝对领导”只不过是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的变种而已，正是这种所谓的“绝对领导”，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国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绝对统治了。……人为地制造思想上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制造思想上的紧张局势，以便合法地对人们实现前所未有的法西斯式的统治，窒息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使人民成为它绝对驯服的工具。

◇ 六〇年胎死腹中的组党计划

▲ 向承鉴的《不打自招——评人民日报社论〈南泥湾的方向〉》（二期）：

由“解放”了的贫农、党团员歌手唱出《社会主义好》改编版：

社会主义糟、社会主义糟！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饿死了！吃树叶，吃野草，人民政府都把粮食刮光了！人民政府害人民，六亿人民活不了，活不了！

▲ 顾雁对当时社会形势的概括：

专制统治的魔影笼罩全国，到处是鞭梢剑影，到处是泪痕血迹。人与人的关系已到了空前虚伪的程度，为了名利地位一切卑鄙的手段皆已使，什么真理、什么道义、什么爱情、什么友谊，这一切都不如统治者的意志那样能立即兑现。（《星火》二期跋）

《星火》二期未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向承鉴）还有攻击中共干部进城后忙于换妻，指斥中共彻底变质：“刘少奇、陈毅的老婆为什么只有二十妙龄、漂亮无比，可是他们自己却是五十开外的老妖魔了！……无数的干部老爷们强霸民家妻女，在他们工作过的地点设下十年到二十年暗窑，恣意作乐！他们变了，在他们身上连每根毫发都不是人的东西了，这些畜牲！……唯有战斗、无情的斗争，把那些杀人的统治者、在我们面前横行霸道过的畜牲统统消灭绝，才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出路！”

《求索》证实了林昭、张春元等人曾有“组织”之议，但因林昭、顾雁的求实与谨慎而搁置。一九六〇年五月，杜映华、罗守志等干部加入，向成鉴竭力主张拟出组织名称与纲

领，拟有“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国共产党革命（或革新）委员会”、“中国劳动工农同盟”，因意见不一，未正式拟定。

谭蝉雪还控诉农民卖人肉包子、换尸相食、食母食子等“新社会新气象”。一九六〇年九月上旬，陇西东铺、土店子车站一带农民发生结伙盗抢火车粮食事件。大饥饿时期，监狱人满为患，囚犯的饭碗舔得比洗的还干净。

向承鉴记载：饥民惟一能决定的是死亡次序，为传宗接代续香火，女保男，长保幼，先死奶奶后死爷，继之死母死父，千方百计保住新生代，尤其男娃。

兰大数学系丁武，陕西人，右派，下放天水甘泉公社劳动，因饥饿难耐，计划逃到缅甸，沿湄公河凫水偷渡，行前对谭蝉雪说：“与其活活饿死不如拼搏一下，不成功便成仁。成功了我会和你们联系，不幸被捕，我就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一辈子成为哑巴，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一米八的旱鸭子天天到水库练游泳，练成后偷偷走了，至今音信全无。

兰大中文系学生右派孙自筠，原为党支部委员，划右后用菜刀剁下自己一截舌头。中文系某班七位女生，她们的男友全划右派，反右后七女生全投入反右英雄怀抱。

◇ 告密者一九七九年狼狈亮相

当时，该案要犯都明白一定出了叛徒，但一直只能猜测“疑似”，无法确认。二〇〇六年终于通过查阅档案，从武山县公安局七九年《关于张春元、苗庆久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材料》中，得到“案件线索来源”。该案起于六〇年四月兰大历史系学生右派陈幼达（与张春元同班），他向甘肃公安厅告发张春元、谭蝉雪、孙和等人经常回兰州，与右派学生来往密切，秘密交谈，散布反动言论，行动可疑。五月二日，武山县公安局再接兰大下放学生右派郑连生、柴志德书面揭发，内称：右派张春元、谭蝉雪、孙和、向承鉴、苗庆久等十五名右派在搞反革命组织。

不过，六三～六五年，兰大下放武山的右派学生大组长马启凯与兰大寝友江先国，根据种种迹象，已排查出郑连生为告密者。再根据郑连生摘帽最早，一毕业即分配工作，其他人则要等待很长时间，判定其“无功不受禄”。七九年右派改正，郑连生也回校办理手续，马启凯、江先国赶到招待所，郑刚想握手言欢，马、江质问：“武山的事是不是你告的密？”“没有！没有！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呢！”“兰大清理阶级队伍是不是你打的黑报告？”“绝对没有！”江先国上前“啪！啪！”两个大嘴巴：“我们代表受害人来惩罚你这个败类！你害死了多少人！”郑不敢还手，抱头鼠窜去找保安，保安问明情况后，连说：“打得好！打得好！该打！该打！”马启凯后为兰大中文系教授。

在狱中，得到“重用的”是刑事犯，狱务公开动员刑事犯：“你们杀了人无非是一条人命，而政治犯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你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是敌我矛盾，所以你们必须严格监督他们的一言一行，靠近政府，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

六五年元月，《星火》案在水体育场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五花大绑的谭蝉雪当时就曾得到一些女狱友的理解尊敬。文革后，谭蝉雪多次去天水搜集资料，当地人一听说她就是当年宣判大会上“那女的”，立刻围上来紧紧抓住她的手，用爱抚目光从上到下边看边怜：“受苦了！受苦了！”使这位坚强的“兰大林希翎”泪流满面，象是回到母亲怀抱。

六四年天水三监，杜映华刑期将满，递纸条征求张春元释放后怎么办？张给杜回纸条，要他到农村去，并“抓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学习马列主义要对照中国现实，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不登堂入室就不能同室操戈。”这张纸条给他定了死罪。

七九年，《星火》案犯们手持中央五五号文件申诉平反，天水中院复查决定：“原案定性不变，维持原判。”因为法院还是当年的原班人马。后捅至省委，省高院成立项目组，来回数次，才艰难地获得平反。

◇ 五十年后还是中国的骄傲

中国政谚：领先三年是先进，领先三十年成先烈。《星火》的“反动性”至今效力犹烈，依然“领先”，对“当今统治者”的谴责锐度依然使我心惊肉跳，与五十年后的官家口径亦相距甚阔。林昭当年就意识到了：“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海鸥——不自由毋宁死》）二〇〇七年二月，向承鉴晚年回首《星火》：“一部真正的中国二十世纪中期的《青春之歌》。”

钱理群评曰：面对公社化运动的惨败、面对农民的饥饿，绝大多数各级干部以“维护党的大局”说服自己，保持了沉默。“如果没有（星火）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向后代交代。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的，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就言论的正义性与锐烈度而言，《星火》这个集体超过了中共六十年治下所有知识分子的反叛与抗争。

张春元恋人谭蝉雪女士历经十二年，数赴兰州、天水各地搜集资料，终于为《星火》、为兰大学生右派留下一本《求索》，一本为历史作证的史料。合上此书，揣上《星火》，抚摸一颗颗年轻的灵魂，深感“历史不能承受之重”。面对这群先行半个世纪的“右派”，面对《星火》垫衬着的“三面红旗”与“阶级斗争”，一声浩然潼关长叹，一阵凛然覆身的历史感涌上心头。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 来源《博客中国》

~~~~~

#### 【往事非烟】

#### 咸宁干校三记

• 王世襄 •

一

文革期间，因只发给生活费，难养五口之家，营养不良而劳动繁重，经常蹬三轮车去大郊亭拉五袋洋灰回沙滩红楼，往返三十多里。至一九六九年肺病复发（“三反”冤狱，还感染上肺结核，释放后治疗一年始愈），且有空洞，医嘱卧床休养。军宣队则勒令必须于十月一日前随同文物局系统下放湖北咸宁干校。

到干校后，先分配看守菜地，随即参加开畦种植。有一天看见田埂上一株油菜遭风雨袭击，根大半外露，茎亦已伤折，但金黄色菜花开得十分灿烂，有的已经结子。我因它而受到激励，口占小诗：

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从此我坚决仿效“菜花精神”，顽强面对现实，不仅要生存下来，还要为人民、为国家勤奋工作，做贡献，出成果。有此精神支柱，居然在艰苦环境中战胜了病魔。到了一九七一年，每天竟能从低洼的水塘中挑一百多挑水浇菜地。军宣队司令在一次对全干校的讲话中说：“你们死了心吧，别想回北京了，把老骨头扔在此地吧！”他自喜已经完成一项“伟大的革命工作”——为一大批来自首都的“牛鬼蛇神”找到了葬身之地。没想到连我这个有肺空洞的病号也能康复，最终返回了北京。当然我是幸运者，死在咸宁、没能回北京的也颇有人在。

“菜花精神”成为我终身的座右铭。天假我年，从干校回京后又争取到三十个春秋。已经出版的约四十种著作，绝大多数是在这些年里完成的。

## 二

老伴袁荃猷的工作单位是中国音乐研究所，也属文化部系统，但干校不在湖北咸宁，而是由天津宝坻迁至团泊洼。一九七〇年五月，该校团部发来电报，告我“荃猷病危”。因无一语言及病情，我猜测不是患了急症，就是发生意外，故焦虑万分。承蒙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先生和北京图书馆冀淑英研究员同情我的处境，欣然借钱给我，才凑够车票费用。但向军宣队请假，以我尚未“解放”为由，坚决不批准。一周后收到荃猷二姐来信，告我所患为精神分裂症，已住入安定医院，似无生命危险，我始稍安。半年后荃猷清醒过来，重返干校。

一九七一年，咸宁干校多人获准离校探亲。我再次申请，仍不批准。

一九七二年，因查明有一个与我同姓名的人曾参加过国民党，与我无涉，才宣布我被“解放”，并批准去团泊洼干校探亲。不料见到荃猷的次日，就收到三封加急电报，命立即返回咸宁。待我询问原因时，军宣队只说“需要”两字。过了两三个月，我连连长（由我所同事担任）透露，只因军宣队看到报上有美国官员黑格来华的消息，怕我和他联系上，所以命令速返。我不禁大笑，一个区区从事文物研究的工作者，只不过在三十多岁时曾出国参观过博物馆，竟能结识现在当政的美国政府要员？军宣队岂不是太抬举我了！别说是黑“鸽”，就是白“鸽”我也不认识。时连中传为笑谈。

## 三

到了1972年，不少人陆续调回北京，每连只有二三十人。食堂粮油满缸，白糖盈坛，圈中肥猪头数不减，常用猪肉换来鱼鳖，故生活大有改善。此时已无人劳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则春挖山坡上的兰草，秋寻栎根上的灵芝，貌似逍遥自在，而实忧心如焚。时光流逝，岁月蹉跎，难道大好年华，竟被如此浪费掉了？也有诗为证：

春蹇兰草秋芝草，朝啖团鱼暮鳊鱼。  
日日逍遥无一事，咸宁虽好却愁予！



按：“愁予”一词出自《离骚》，屈原正是用此二字来表白心态的。

□ 选自《北京文史资料》第69辑，其中前两记被收入《锦灰三堆》一书，题为《咸宁琐记》。

~~~~~

【动乱年代】

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下）

• 杜钧福 •

（上接 zk 2 0 0 6 a）

◇ 朝鲜族人员逃离事件

在当时的我国，朝鲜族可能是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在文革前，中关村地区的高校、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中，朝鲜族所占比例远超过这个民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绝对数目也可能超过回族。

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9月，廖承志在北大的一个国际问题报告中，明确指出朝鲜也“变修”了，虽然没点名。他说：“对某一个角落的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也不复杂，坛坛罐罐多了，怕打破坛坛罐罐，因此就怕革命，看见中国人民起来革命就吓破了胆，跑到莫斯科的怀抱里去了。”此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据说两国在鸭绿江两岸安装大喇叭相互攻击。

1967年下半年，朝鲜开始通过驻华使馆到中关村地区挖人，组织朝鲜族的科学院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逃往朝鲜，当然给予他们若干许诺。

要是在文革前，这种逃离是不可能的，因为控制得严，也因为当时大家认为还有前途。但是文革开展一年多，对时局都很失望，特别是1968年以来，举行什么“早祝晚颂”那一套，按一位朝鲜族朋友私下所言，跟宗教仪式差不多，也使多年来培养的信仰坍塌。

1968年上半年，这种活动达到高潮，有总数大约几十人参加。他们按照朝鲜使馆一位李先生的安排，从我国东北地区一条秘密途径前往。他们都是携妻带子，可能还带了一些家当，所以不可能十分隐秘，于是大部分人被抓回。当时处理尚比较宽松，只在单位内隔离审查。科学院的都关在院里审问。其中党员都被处理，但是文革后平反了。至于成功逃到朝鲜的，据说都很后悔，还有些被遣返回国。

◇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8年7月3日，院革委会宣布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但是在北京，这一运动从1968年春季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运动的轨迹是先历史后现行。历史问题，例如什么“漏网右派”问题，都提了出来，对有历史问题的人成立专案组，外查内调。劳改队也重新成立起来，收容一些有问题的人。

从内战、选举革委会、军代表进驻、开展斗私批修，以及1967年夏开始的修建毛主席塑像运动，人们对那些很激进的造反派开始失望。这些激进造反派也不适应这样的新形

势，因而革委会虽然仍由造反派掌权，但是多为那些比较正统、稳重的造反派被选举到领导岗位。清理阶级队伍的前半期，是在这些造反派掌权时期进行的。所以这些掌权的造反派也应对这个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负一定的责任。

1968年8月，近年来毕业分配至科学院的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下放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很多文革活跃分子包括在内。

1968年9月2日，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科学院及所属各所，全面接管权力。他们以知识分子的改造者自居，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大造声势，形成一种非常恐怖的气氛。他们把主要矛头对着已不掌权的激进造反派。

1969年，经周恩来批准，已经下放到解放军农场的两位原“红联”的骨干成员被揪回北京接受审查。其中一位是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溪，名义上的罪名是反江青，其实也就是私下说江青几句坏话。这之前，在196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全会上，周恩来在批判“二月逆流”的讲话中已经点了徐鲁溪的名。由于受到这个徐鲁溪的牵连，在批判“二月逆流”时，“红联”这些人也受到批判。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另一严重受迫害群体是高级知识分子，即科学家。此时我们必须提到科学院的京外单位。当时科学院在京外各地分布着几十个研究所，分属几个分院领导。在文革初期，它们的文革均纳入各地文革进程，实际与北京关系不大，所以没必要在本文叙述。在这些京外单位中，以刚从北京搬去的贵阳地化所的表现最为突出。

因为京外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晚于北京，到这个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时候，已经有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了，所以和北京不同，这个运动从开始就在军宣队领导下进行。在这些京外单位中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远比北京激烈，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很多知识分子包括著名科学家被迫害致死。其中最恶劣的是东北地区 and 上海。

在东北地区，以长春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简称光机所）和大连化学物理所最为突出。这两个所都是科学院的骨干研究所，为我国科学事业贡献甚巨。当时在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单奎章的把持下，光机所变成迫害知识分子的人间地狱。单奎章在该所大力推行极左路线，说光机所是“特务窝”，他为所欲为，刑讯逼供，草菅人命，令人发指，整出了四条“特务线”。全所有300多人被诬陷“与特务有牵连”，150多人被隔离审查，5人被送公安机关，13人被逼自杀。

由于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科学家数目很少，现在分布全国各地。这些研究所整出来的“特务线”必然牵动全国各个科研单位和高校，于是各地高级知识分子全都遭劫。如管惟炎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物理所所长、磁学家施汝为：“后来发现从别的单位传来说他也是特务，全国所有像他从国民党留下来的全都是特务，一个咬一个越咬越多，……”（《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在京区，有物理学家张宗燧、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动物学家刘崇乐等著名科学家被迫害致死。

当时科学院京区职工总数9279人，被群众专政和隔离审查的881人，其中被定敌我性质的102人。副研究员以上高级研究人员180名中，被立案审查的107名，其中83人工资被扣，每人每月仅发给相当于原工资6%的生活费。

在这场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没有公布，但肯定是文革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期。清理阶级队伍是科学院文革中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

◇ 批判相对论

文革中的批判相对论有官方和民间两方面。这种批判由来已久，认识根源是从直观感觉无法理解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从而怀疑这些理论不对，总企图用经典概念解释。

1967年下半年，北航《红旗》到湖南醴陵串联的学生在当地发现一位中学物理教师周友华在批判相对论，就把他带到北京活动。这个周友华，除去不赞成狭义相对论的光速不变原理外，还观察了一个单摆运动的季节变化，并得到结论，说温度影响重力，温度越高，物体重量越轻。这个结论，他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物质形态间总是相互作用。别人告诉他，这只不过是冷缩热胀造成的，他不信。

周友华到京后，去科学院物理所活动。物理所革委会派一位和他岁数差不多的年青人帮他理清思路。他却很不理会这个帮助者的意见，说他是反动权威。所以这反映了批判相对论的社会基础就是文革前和文革中贬低科学家的宣传。

1968年2月，在物理所召开辩论会。周友华首先讲述了他的理论，然后自由发言。其中绝大多数发言者都首先表示，周友华想把毛泽东思想贯彻到科学研究中去很好，值得鼓励，然后说从科学观点他的理论不对。只有一位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表示同意周友华对相对论的批判。最后，院革委会委员、自动化所的陈小虹表示支持周的批判。后来物理所又组织了一次辩论会，但是周友华没有参加。在这第二次会上，所有发言者均表示不赞成周友华，陈小虹也宣布撤回了上次的支持。

但是事情没有完，院内一些人组织了一个相对论的批判小组。参加者的动机是复杂的。他们对相对论的认识当然没有像周友华那样肤浅。在学术意义上，相对论也不是不可批判的。由于文革中，所有理论研究均遭批判，被说成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家无事可干，这一来有了借口。郭沫若的儿子郭汉英后来对台湾《物理》杂志说，他其实是反对批判相对论的，参加这个批判组是到里面当“内应”。

这个小组一方面学习有关知识，一方面写批判文章。1968年7月5日，科学院革委会向毛泽东、中央和中央文革报告称，最近组织了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原理”。他们的活动终于在1969年秋得到上面的支持。支持源于毛泽东（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个条子，问相对论能不能批判。陈伯达询问了几位科学家，回答各异。这也许鼓舞了陈伯达，他遂布置科学院关注这一批判。毛过问批判相对论一事，刘西尧在1971年也曾透露过，可作为佐证。（郝柏林《负载吟啸录》，八方文化创作室，2009）

1969年10月23日，院革委会邀请了一些著名科学家开会讨论这个批判组写的批判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以后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会议由院军代表郝梦笔主持。何祚庥第一个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批判相对论。然后周培源发言，表现出一些保留态度。其他一些科学家也纷纷发言，与其说是支持相对论，反对批判不如说含糊其辞，虚与委蛇。他们都说相对论应该批判，但是都不明确支持批判小组的这篇文章。所以最后军代表总结时只能说，再努把力，写出两篇三更好的文章来，实际上否定了这篇批判文

章，当然也未能在《红旗》上发表。这次会后，科学院批判相对论的活动逐渐沉寂。陈伯达又去北大兜售这一批判。科学院这个批判小组逐渐转入理论物理的研究，文革后大部分成员进入新成立的理论物理所。

1970年3月，陈伯达又在首都钢铁公司组织了一次“炼钢自动化”攻关。由于钢铁学院、钢铁研究院这些单位都已下放到外地，他主要从科学院找人参加。当时有自动化所、力学所、物理所等几个所几十位人员参加，生物物理所的专家贝时璋也去过一次。由于这些人对炼钢都是外行，干了几个月没搞出什么名堂，后来随陈伯达在政治上失势，这一活动就结束了。但是很多技术人员从此开始学习使用计算机，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伯达把“青年人比老年人强”的思想发展到极致，在首钢多次说要请中学生来参加。按照这一思路，科学院还制订了要面向中小学的发展方向。

◇ 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运动

这个运动在全国正式展开在1970年3月，但是在科学院，从1969年底就开始舆论准备，1970年1月正式开展。当时工宣队已经撤离，运动主要在各级军代表主持下进行。这个运动和当时的“一打三反”运动结合在一起。当然也抓了其他类型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以抓“五一六”为主。

因为“五一六红卫兵团”是反周恩来的，所以这次运动主要清查反对周恩来事件。如果没有反对周恩来的，就清查反对总理联络员的。所以主要矛头对着比较激进造反派，即“红联”一派。

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的表现，很多造反派不满，但是公开反对的基本没有，只是在私下有些议论，如认为总理“婆婆妈妈的”，说话不像中央文革那些人那样痛快。可是到了1966年底，周恩来宣布张劲夫等是个反党集团，超过了造反派的口径，造反派就感觉原来错怪了周总理，还是总理想的周到，如果一开始就宣布打倒，会像北大一样，阵线不再分明。所以那以后，就无人埋怨周恩来了。至于反对总理联络员刘西尧，是另一回事。现在这些成了罪过。物理所的军代表王铁军在全所大会上给这些人定性说：“有些人议论总理”，说得非常恰当，但是议论一词什么意思，则见仁见智，在当时是个大罪名。

对被审查人员办学习班，其中一些人被不同等级的隔离。开批判会，制造恐怖气氛。在压力下，一些人承认参加了这个五一六反动集团，并交代了同伙。于是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总共抓出的“五一六分子”数目远超过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的人数，因而成为科学院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

1970年11月14日，院里在中关村大操场开全院大会，由物理所、化学所两个“红联”小头头交代他们参加“五一六”的问题，并且从他们的口揭发，“红联”的各级组织就是“五一六”的各级组织，“红联”的各级头头就是“五一六”的各级头头。他们交代后，就立即被宣布“坦白从宽”，当场释放。还有一个“抗拒从严”的，被当场逮捕。这种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五一六”组织的做法，即使在当时也是少见的。

这当然造成大面积冤案。一些专案组成员今天还在审查别人，明天自己也变成被审查者。“红联”的头头当然受到更严厉的逼供。原“红联”主要领导人、曾任革委会常委的数学所的邹协成在拘禁期间被迫跳楼自杀身亡。

这些被审查者的胡乱供词当然无法合理衔接。如此多的“五一六”分子，头脑正常的人也不会相信。汇报到中央，负责这次运动的吴德、谢富治等人也很困惑。但是周恩来解脱了这个危机，他宣布要“重罪行”：以前说你是“五一六”，现在也没说你不是，只是不跟你计较这个，只从你的“罪行”定罪。至于什么是“罪行”，比“组织”来说，更容易构织。

实际上，在这个运动中所批判的所谓“罪行”，除去反周总理还有“反三红”，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反革委会，在两年前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全都揭发批判过，也处理过，没有什么新的材料。

这个运动到了1971年“九一三”以后就逐渐沉寂了，但是被审查人员在几年里长期得不到解放。最坏的是，把很多人“内定”为敌我矛盾，但不告诉本人。例如到了1973年，一位干部被派往高能物理所，发现“文革刚结束，有相当一批技术骨干是文革中的造反派，都有政治问题，有20余人被内定为敌我矛盾。”（《崔培荣》，百度百科）这些人数之多已经到了难以开展业务工作的地步。后来这20多人被解脱了。很多人一直到1975年胡耀邦等人来院后才得以解决，但是始终没有被正式平反。

这个运动主要对着“红联”一派。作为院领导之一的造反派王锡鹏不属于这一派，也找不出什么明显的把柄可整。但是，在科学院计划座谈会期间的1971年3月17日，周恩来接见全体会议人员时说：“那一年7月30日大会是怎样开起来的，你们搞清楚没有？科技大会推荐了两个造反派，一个张本，一个王锡鹏。他们受到陈伯达的表扬，王、关、戚的推荐。开这个大会，我们都不晓得。”于是借口和陈伯达有关系将王锡鹏解职审查，后来居然也将其打成“五一六分子”。此后，居于领导位置的造反派只剩柳忠阳等极少数人了。

王锡鹏担任院领导职务后做过一些工作，如处理科技大学外迁事。他未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也未表现揽权，在两派斗争中立场比较超脱。他是科学院造反派的标志性人物，1966年7月30日大会是科学院造反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对两者的否定意味着对初期造反运动的否定。

◇ 对外开放

1972年初，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成为开始对外开放的信号。因为科学离政治最远，所以科学院走在前头。首先是外国科学家来访。1972年2月，瑞典天体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来访。这次来访是文革前就已经确定的，但拖到此时才得以实施。在对美交流方面，是华人科学家打了头阵。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早在1971年夏就第一次访华，并被毛泽东接见。1972年7月，以任之恭、林家翘为首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保钓代表来华。7月14日周恩来接见他们，并当场宣布了林彪事件。

1972年10月6日，科学院派出了文革开始后第一个出国访问的科学家代表团，以贝时璋为团长、白介夫为副团长，对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进行访问。代表团12月16日回国后，曾向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汇报，但是核心小组为了避免引起“思想紊乱”，决定不向科学界传达。这个科学院的核心小组是1972年7月成立的，郭沫若为组长，刘西尧、武衡、王建中为副组长。

1972年8月18日张文裕等18位科学家联名给周恩来写信，反映发展中国高能物理的意见和希望。9月11日，周恩来回信表示支持。1973年5月中旬至7月上旬，科学院派张文裕团到美国和日内瓦欧洲联合核子研究中心参观访问，考察高能物理研究和加速

器建设。9月，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的报告。此后由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干扰，加速器预研被迫停顿。

1974年，科学院开始向外派遣公费的“访问学者”，主要是到西欧各国工作一段时期，一般为期两年。这样一批学者归国后，一般成为研究骨干。

此时已有一些政治条件好的研究人员外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学术访问。封闭了多少年以后，走出国门所见所闻带来的思想震撼是巨大的，国外一些事物如超级市场以前闻所未闻。但是他们回来后又不敢如实叙述，最典型的说法是外国“不是想象（或传说）那样好”。

在这段时期，旅美华人科学家对我国科学事业帮助很大。1971年，在美华人华侨掀起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许多华人科学家成为运动骨干。他们大多出身台湾，但在运动中思想迅速倾向大陆。1972年后，他们中很多人相继访华，以各种形式与大陆科学家合作研究。也有一些人从1973年开始回大陆定居，主要安排在科学院工作。但是鉴于当时国家外交政策，他们的保钓宣传没有受到积极支持。

1972年7月，美国一所普通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牛满江访华。1973年后，在科学院的支持下，他多次回国与科学院的生物学家童第周合作研究细胞发育遗传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在《中国科学》发表后，从1974年就受到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科学家的质疑，后来外国同行也不认可。但是从政治上考虑，1975年经中国科学院批准，动物所制定了细致的对牛满江的接待计划。“重点之一是做好对其有质疑的群众的工作，宣传牛满江此次来访在更好地配合对外斗争和对台工作，以及扩大我国政治影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他有伪造试验数据、利用行政力量打压不同意见者这些劣迹，但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国家领导予以支持到文革以后多年。直到2006年，《南方周末》发表揭发此案的文章后，还被迫发表检讨文章。

◇ 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科学院发生这样一件事：1973年夏，科学院开始筹建感光化学研究所。由于进展缓慢，一些筹备处人员乘批林批孔运动之机，于1974年37日给江青写了封信，声称院里主持该工作的武衡应对此负责，科学院出现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妖风。由于这个所涉及电影胶片，江青当然很关心。她于3月10日回信说：“我只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即学习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3月12日，他又向感光研究室送一篇署名文章《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把江青的信连同署名文章印发全院人手一份，号召向院内“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猛烈开火，还召开院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不积极开展批林批孔，压制新生力量，以及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复辟回潮的事例。

此时在院里主持工作的是核心小组副组长周荣鑫。他是1972年应郭沫若的要求调来科学院的。他在科学院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还是很主动的，似乎和后来他调至教育部后的作为有所差别。

科学院的批林批孔运动主要应批判武衡。但是他在这一时期正生病住院。等到他出院以后也没怎么挨批，因为“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核心小组成员之间矛盾激化，闹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批判他了。（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

江青对科学院印象不好，可能与陈景润事件有关。1973年3月，江青从一份内参中看到关于科学院数学所的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数学难题作出重要贡献，但是身体很不好，经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救活陈景润”后，派遣迟群会同武衡、协和医院的张效骞等于3月25日到陈景润住处（即中关村88楼）看望，将他送去体检后住进309医院。陈景润的论文也在英文版的《中国科学》上发表。实际上，当时陈景润身体固然不好，还没坏到要“救活”的地步。他当时也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后来作家徐迟《歌德巴赫猜想》一文有许多煽情的描写都是夸大其词。他就是性格内向一点，这在科学院也不罕见。

到了1975年，科学院又发生一件事。当时毛泽东要看科学院所属单位主办的《化石》和《动物学报》，要求专门给他排印大字本。这项要求使得两杂志编辑们兴奋不已。科普杂志《化石》的一位编辑张锋乘势在9月6日向毛泽东寄出一封信，诉说想把刊期从半年提高到季刊所遇到的困难，并把问题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9月16日，毛泽东对来信作出批示，说是“一封诉苦的信”。此时胡耀邦等已经来到科学院。他们不敢怠慢，赶紧召开全院大会落实，将有关人员批了一顿，对有关具体问题作了处理。

这几件事说明，在当时，上上下下无贤不肖，都把“路线斗争”当作无攻不克的咒语，当作争取自己利益的工具。社会道德败坏到如此地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此外，王洪文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以后，也曾问过科学院的业务工作。他曾多次来院视察卫星工作，还曾接见物理学家李荫远，询问研究碘酸锂晶体事。

◇ 胡耀邦“百日维新”

1975年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科学院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刘华清参加党组主管业务，王屏参加党组主管政治工作。后来胡克实也调来，科学院再次成为藏龙伏虎的地方。胡耀邦等于7月18日到任后，马上开展了一些调研工作，于8月11日起草完成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经修改后，于8月17日以胡、李、王三人名义上报，后经胡乔木主持修改后改称《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于9月28日报送中央、国务院。因毛泽东提出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不是他的话而没能下发。（程中原《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回首文革》）

武衡认为“这个汇报提纲看起来紧紧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面地论述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方针，四平八稳，无懈可击，似乎谁也感觉到什么不同的意见。汇报提纲对当时科学技术事业所遭受的严重破坏，对极左思潮造成的思想混乱，只字未提。”

所谓“四平八稳”，说的是该文件全文结构都是这样的：先说一方面应该如此，再说另一方面也应该如此，等等，所以后来被批判为“二元主义”。

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为了防止挨批，“四平八稳”是难于避免的。胡耀邦、李昌之所以挨批，问题可能主要还不在于这一文件，而和他们到科学院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有关。所以在他们向邓小平汇报时，邓要他们少讲话，可能已经听到了一些反映。

他们的矛头所指，主要是对待科学技术、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认识和政策。例如他们批判“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的说法。现在一般认为，胡耀邦等人到科学院是对着四人帮来的。就意识形态来说确实如此。但是除去有关江青的几件事以外，四人帮对科学院的直接影响不大。他们所批判的极左思潮也不仅仅是四人帮的专利，而是从文革前就泛滥在知识分子界的陈词滥调，所以深受科学院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他们这种主张实际上和毛泽东的

“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相抵触，所以不能为毛泽东接受。

胡耀邦等人空降到科学院类似于派工作组，所以事情的发展也显现出工作组模式的问题，就是往往过于否定原有的干部和原有的工作成绩，未能尽量团结原有干部共同进行改革。他们以大刀阔斧的姿态推行改革，有强烈的号召力，但急于求成，进驻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总结性的文件（这也是中央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按管惟炎的说法，胡耀邦“太容易冲动了”。所以这一“百日维新”和历史上康梁所为有共同缺点，应为以后所有改革家鉴。他们这种单打独斗遭到挫折后，也使权力出现真空，为柳忠阳这种小人所篡夺。

胡耀邦在科学院办的一件实事是关心研究人员的生活，即所谓“五子登科”。具体事例是开始建筑一批住房，但进展极为缓慢，直到1984年才落成。那年笔者从俗称“鸡窝”的平房宿舍搬进这批楼房。作曲家王立平曾到这一“鸡窝”访友，惊诧于研究人员居住条件之恶劣，用自带相机拍摄数幅照片，在1979年的“星星美展”上展出。当时我们谁家也没有相机。

◇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控告迟群信的批示。11月15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清华大学的问题。胡耀邦、李昌也参加了会议，并事先通知他们做检查。当天晚上，王洪文和胡耀邦谈话，指责他说过的一些话。（唐非《胡耀邦传》，人民出版社，2005）

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提出了“右倾翻案风”问题，从此在全国开展了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使邓小平主持下的整顿中断。作为批判对象的是“三株大毒草”，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胡耀邦、李昌被停职检查。

胡耀邦、李昌，以及他们写的“汇报提纲”遭到批判可能与柳忠阳等人的活动有关。1975年12月，柳忠阳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胡耀邦等人的问题。毛对两封信的一次批示是“印发政治局，予以调查研究”，一次批示是“印发政治局”。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许多地方被压制的造反派想乘机翻案，十年文革中一些冤假错案的苦主也不断上访。但是科学院没有这样的事。在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制造冤案打击造反派的主要是军代表，柳忠阳等人也有份。由于以后几年科学院的领导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后来的领导干部对这些运动没有责任，所以被打击的造反派都是在周荣鑫、武衡、胡耀邦等人在任时获得解放的。他们认为柳忠阳这些原来的造反派右翼早已变成毫无原则的投机分子，所以主要反对的是这些人。他们对外来的军代表并无很大意见，身为知识分子，当然和其他群众一样，也非常拥护胡耀邦。所以在这一时期，科学院几乎所有群众的政见都非常一致，柳忠阳等沦为毫无群众基础的一小撮投机分子。

1976年2月7日，科学院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大会。因科学院是当时批判重点单位之一，宣传部门特别重视，派遣许多记者前来采访，并计划在电视上报道。这天胡耀邦请假未来。李昌虽已遭受批判，但并未撤职，名义上仍为科学院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座。会议开始后，有群众递条子，说好久没开全院大会了，大家都不认识诸位现任院领导，希望能现场介绍一下。于是会议主席让各位领导逐一站起来介绍。当李昌站起来的时候，全场人员热烈鼓掌，经久不息。等柳忠阳等人站起来的时候，嘘声四起。介绍完毕，

进入批判发言正题，群众纷纷借口上厕所逃离会场。主持者见状忙找人在大门口堵截，严令不许离开。于是人们都拥挤在走廊上闲聊，会场里听众稀稀拉拉，不成体统。会议草草结束，电视报道也泡汤了。

这件事充分说明科学院当时的人心所向，也说明，经过十年文革的折腾，群众有了独立辨别是非的能力，也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政见的安全方式。

这一事件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在科学院的预演，也说明了为什么科学院的人参加“四五”事件那么积极。

◇ 天安门事件和文革结束

后来就是天安门事件或称“四五”运动了。据说，参加“四五”事件最积极的，第一是七机部，第二是科学院。其实七机部一些单位也是从科学院分过去的。例如自动化所分到七机部一个502所。天安门事件后，两所的人共同编辑《天安门革命诗抄》。当时科学院最出风头的是109厂（即后来的微电子中心）。他们制作了四幅写有“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的大标语送到天安门广场、竖在纪念碑周围。

参加这一事件的群体分析缺乏数据，因为当时没有人敢出头。我听计算所一人说，其实积极参与的人都是原来“反总理”的。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反总理”的人变得拥护总理，认为他们“别有用心”。这说明一种现象：运动初期被说成“极左”的造反派现在持“右”的立场，而原造反派右翼柳忠阳等成为拥护“四人帮”的极左派。

天安门事件很快被宣布为反革命性质，109厂有三位诗作者被捕，17人隔离审查和停职，30人被勒令交待，重点审查对象70人。计算所、半导体所等单位还有十多人被遭到拘留。

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柳忠阳等自以为得计。4月21日，他们以院党组的名义签发《关于胡耀邦、李昌反对和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言行的报告》，其中还批判了武衡，送至中央办公厅，“受到呵斥，被退回科学院。”

如果他们看一下黄历上是什么日子，就不会找这个钉子碰。原来分工负责科学院的中央领导是华国锋。胡耀邦等来科学院时直接向他们布置任务的也是华国锋。胡耀邦等来院后华国锋主持了关于百家争鸣的科学家座谈会。根据他的指示，胡耀邦等又连续召开了四次这样的座谈会。所以批胡等于批华。特别是这个柳忠阳，野心很大，敢直接向华国锋叫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于光远谈华国锋》，人民网，2012）

1月8日周恩来去世后，2月2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天安门事件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他虽支持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但是当权后与“四人帮”的矛盾上升。我们当时听过他的一些讲话传达，如唐山地震时期的一些指示，都比较务实，和“四人帮”的论调有相当大的距离。他对胡耀邦和李昌，也未作任何正式组织处理，直到文革结束。当然他肯定记得柳忠阳这个名字。于光远批评他过于软弱，我看他是绵里藏针。

科学院的“汇报提纲”是胡、李、王三人签署的，为什么只批胡和李呢？“中国科学院，柳忠阳受‘四人帮’的指使，整胡耀邦、李昌，同时进去的王光伟屈服。”（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大风出版社，2006）柳忠阳连个核心小组副组长也不是，却能兴风作浪，是因为在变幻无常的政治环境下，一些当权的领导干部无所适从。他们为了自保，看风使舵、投机取巧。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光把帐算在柳忠阳身上是不公平的。

毛泽东去世后，10月7日科学院核心小组开会，讨论建议将胡耀邦、李昌、武衡、胡克实等从核心小组里除掉，王建中回部队，柳忠阳、党文林、李先惠等三人增加为副组长。

他们的好梦不长。就在他们开会的前一天晚上，华国锋、叶剑英逮捕了“四人帮”。11月5日下午，揭发批判“四人帮”插手科学院罪行大会在北京召开，柳忠阳到会接受批判，很快被从核心小组除名。1977年初，中央把方毅派到科学院主持工作。

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结束了。

□ 原载《昨天》，少数词句略有改动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